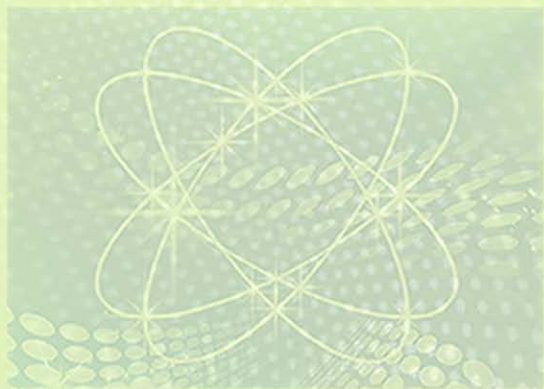


课外语文

语言的奥妙



目 录

语言小史·····	(1)
我国古今的通用语·····	(9)
佛教对汉语及汉语研究的影响·····	(19)
古代性隐语·····	(27)
俗语扫描·····	(31)
民间秘密语漫说·····	(34)
当代形形色色的黑话·····	(36)
“三日”座右铭·····	(38)
丑语探美·····	(39)
吉语寓意趣谈·····	(41)
成语:语言中的盐·····	(43)
谚语:智慧的花朵·····	(45)
比比谚语和成语·····	(47)
熟语·格言·警句·····	(48)
歇后语·····	(48)
绕口令的产生和发展·····	(49)
有趣的成语之最·····	(52)
成语对举·····	(54)
语言种种·····	(55)
谦词雅语种种·····	(55)
数词系列的演化·····	(57)

语言的智慧之花(五则)	(58)
古今姓氏难字辨释	(61)
古人名正确读音	(63)
“黄犬奔马”句法撷趣	(64)
古代汉语常用工具书	(66)
说用典	(67)
汉语方言形成的多元性	(75)
大陆使用频率高的新词和惯用语	(79)
大陆与台湾语词的差别	(81)
全球兴起中文热	(83)
中国古代的翻译	(86)
我国语言文字知多少	(88)
少数民族语言的几个主要体系	(89)
春联小史	(91)
对联种种	(92)
谜语起源五说	(118)
谜语的特点和作用	(121)
谜种趣谈	(123)
中国灯谜的谜格	(127)
古寺中的“物谜”	(130)
汉字的谶讳术和字谜	(131)
拆字趣谈	(134)
妙趣横生的谜诗	(136)
台湾思乡灯谜	(139)
郭沫若解寿谜	(140)
谐趣	(140)

语言小史

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就产生了各自的原始语言。后来，语言随着社会的瓦解而分化，又随着社会的统一而融合。在氏族不断迁移和分散的情况下，语言分化过程占优势，阶级和国家出现后，分化过程和融合过程交叉进行。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多种语言。

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时，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会随之分化为独立的语言，而新的国家政治力量又把这种分化结果固定下来。例如：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古拉丁语也随之衰亡了，而从6世纪到9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语、法语、罗马尼亚等等罗曼系语言。

语言的统一过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之外，还有异族语言的交融。例如，在11世纪，不列颠岛被法国的诺曼族征服，很长时间内英国贵族讲法语。在中古英语时期，英语和法语都在交融。结果是英语取得胜利，1362年，英王规定英语为英国统一的语言。但在现代英语中留下很多法语的借词，这就是交融的痕迹。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也是语言交融和统一的过程。汉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近1 000年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首都，其中有四个朝代是由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统治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在语言交融过程

中汉语终于成为胜利者。而且，由于政权长期统一的作用，吴语、闽语、粤语等等方言都没有分化为独立的语言。

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汉语，在国外也有人称之为华语。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在他的《世界语言》（英文版）一书中提到汉语时说：西方语言学家们经过长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后，认为“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这是令人满意和自豪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智慧”更为宝贵的东西呢？

在讴歌汉语优势或优越性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鲁道夫·弗莱奇博士。他在一本谈英文写作技巧的书中，十分详尽地讲了汉语的优越性。他说：约莫 50 年前，全部语言学家几乎都认为中国语是人类的“婴儿语”——可是大家都错了：原来中国语（指汉语）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语言。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停地简化着自己的语言，才得以出现现在的样子。

他还特别强调说：幸亏语言学家们做过研究，我们现已查明，原来几千年前的中国语也有格位词尾、动词词形变化和烦人的语法；也和许多别的语言一样又噜苏，又不规则，又麻烦。但是，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琢磨”，它却成了圆润而流畅的意念表达“机器”了。这岂止是一种语言，简直可以说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最新式，因而也是最巧妙的机器。没有任何一种拼音化的语言能象它这样：提前把语言的预制件生产出来……

从弗莱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汉语的简洁性、准确性、严密性、先进性以及它的科学性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强加给“中国语”的荒谬论点。他的论断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说明了中华民族（以汉语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是落伍者、不是掉队者、没有因循守旧；它是在历经沧桑，不断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把那些语法复杂、词法复杂的陈旧语言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反复强调，正是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

这些话当然不能迷信，但也不能充耳不闻，如果是自己说自己好，那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别人说我们好，又不是出于某种偏见或有意吹捧，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思索一下了。

“汉语”和“中文”的区别

“汉语”和“中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汉语，”是汉族语言的简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除汉语以外，尚有满、蒙、藏、朝鲜、维吾尔等兄弟民族语言，通常说的汉语，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包括使用汉语地区的方言。由于汉族人数众多，使用汉语的地区广阔，汉族文化历史久远，汉语自然成为我国的主要语种，也是历代的官方语言。

“中文”是中国语文的简称，它与“汉语”的区别严格来说，汉语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中文”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问题。

“语文”名称的来历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时，有一门功课叫“国文”，教的是文言文。“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小学“国文”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提倡教学接近群众实行语言；中学仍称“国文”，侧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白话文。1949年6月大陆大部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研究全国范围使用的教材时，确定中小学都应学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并要求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同时，采纳了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汉字用拉丁字母注音，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25个字母给汉字注音。目的都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以后，又陆续出现过多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威妥玛式”，它是鸦片战争后曾任驻华公使等职的英国人威妥玛所拟。1892年，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卢懋章，仿照拉丁字母笔形自造了一种“切音新字”。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制定了“国语罗马字”。1931年，教育家吴玉章等人又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为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的逐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倡导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1977年，

在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通过了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中国地名的决议。从此我国自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登上国际舞台。

汉语声调的词义象征性

在汉语中，声调变化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古汉语分平、上、去、入四声，诗人们把四声分为平仄两大类，平声轻盈悠扬，仄声（上去、去声、入声）凝重短促，平仄交错才能韵律和谐。《说文解字》云：“凡草曰零，本曰落。”《庄子·逍遥游》成玄英疏云：“散为尘，赋为垢。”又云：“熔金曰铸，范上曰陶。”在这种连文异义中，不难发现，含“轻”意者为平声，含“重”意者为仄声。“草”比“木”轻，所以“零”为平声，“落”为仄声（入声）；“尘”比“垢”轻，所以“尘”为平声，“垢”为仄声（上声）；“土”比“金”轻，所以“陶”为平声，“铸”为仄声（去声）。由此可见，汉语的声调对词义具有象征性。

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熔铸了一个古老民族对宇宙发生的原始直觉。古人认为，“天地混沌如鸡子”（《三五历纪》），后来，“元气初分”（《说文解字·地》），“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列子·天瑞》）。汉语声调的分配法很可能受这种原始直觉的影响，而不是人们粗暴地把“轻”、“清”、“天”乱点为平声，把“重”（去声）、“浊”（入声）、“地”（去声）乱点为仄声，而是这些音自己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因为它们对其所代表的意义有一种象征关系。推而广之，飘、扬、漂、浮、飞、翱、翔、翩、悠、升等词为平声，降、坠、堕、破、碎、废、溃（以上去声）、绝、裂、折（以上入声）等词为仄声，也体现了音义的象征关系。

《孟子·梁惠王上》云：“天油然作云，沛然而雨。”言兴“云”则曰“油（平声）然”，言降“雨”则曰“沛（去声）然”，其中声调对语义的描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说“欣（平声）然接受”、“安（平声）然无恙”，又说“断（去声）然拒绝”。“怅（去声）然若失”，“怆（去声）然涕下”，而不说断然接受，怅然无恙，这虽是词义的不同，但也是声调的不同象征性。

汉语有很多多音字随着词义的加重，字音由平声变为去声，这也可以体现出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例如“闷”（mēn）的词义比“闷”（mèn）轻，“横”（héng）的词义比“横”（hèng）轻，而词义轻者为平声，词义重者为去声。又如“难”（nán）指困难，而“难”（nàn）则指苦难、灾难，是加倍的困难了；“纹”（wén）可以指花纹、皱纹，但当指陶瓷器具上的裂痕时，就要读成 wèn 了，读音由平声变成了去声；同样，说话的“说”读作 shuō，但当“说”的目的性加强，而变成劝说别人，使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时，就要读作 shuì 了；奔跑的“奔”读作 bēn，但当“奔”的目的性加强时，就要读作 bèn 了；哄堂大笑、哄动、乱哄哄的“哄”读作 hōng，其偏重于对情状的客观描写，但是，如果说“起哄”的时候，就要读作 hòng 了，因为在这里含故意吵闹的意思。目的性被强调了。如此等等。

国外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典型的不可论证性的语言，这是错误的。从书写符号来看，任何一个汉字都具有可理解性，都可以分析论证。而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表明，汉语的音义之间也存在着可理解性和可论证性，而不是完全任意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迅速掌握汉

语，甚至对我们的语言启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官话·国语·普通话

官话、国语、普通话这三个名词是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不同称谓。然而，这三种称谓在英文中都对应同一个单词——Mandarin。经查词典，Mandarin 的汉语释义是：

（中国）官话，指；日中国宫廷和官僚阶层所讲的北方话；（中国）国语。（《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年版）

（旧用法）清朝高级官吏；（标准）中国国语（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使用）。（《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 年版）加拿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词典（Gage Canadian Dictionary, 1983）中，Mandarin 的英文解释译成汉语为：

1. （历史上）中国宫廷内、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

2. 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话语。

Mandarin 一词之所以有以上释义，与它的来历有关。据说该词是英国人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创造的。马嘎尔尼是英国派往清政府的第一个使节。他于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曾两次谒见乾隆皇帝。他发现清朝朝廷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用的语言不同于各地方老百姓说的方言，而这种官场用语，地方上称之为“官话”。于是他把英文中 mandate（命令，委任）一词加上 rin（“人”的谐音）构成 Mandarin，表示这是朝廷委任的官员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于 1794 年回英国，此词也就随之进入英文词典。

暂且不论此传说是否属实，总之 Mandarin 一词的释义就是指中国旧时的官话、现时的普通话（或国语）。

“官话”一词早在马嘎尔尼来华之前就已产生了。明代何良俊所著《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有文：“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可见明清时代“官话”已是上层社会的时髦用语了。然而“官话”的根基不过是汉语中通行较广的北方话。

辛亥革命以后，“官话”一词废弃，改称“国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官话”和“国语”有一个共同的义项，即“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语”一词不用，改称“普通话”，而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仍然保留“国语”之称。不论使用哪种称谓，海峡两岸在推广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上，可谓异曲同工。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学子出国留学，普通话随之席卷海外，“普通话”一词也自然为广大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所认同。可以说现在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同胞都知道“普通话”所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即他们所谓的“国语”，而不是别的什么语。既然如此，继续沿用“普通话”这一名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笔者听到一种说法：“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通用语”（《咬文嚼字》1996年第2辑），并认为这样做“在国际上也能接轨”等等。也许“通用语”一词比“普通话”在概念上更贴切，但是，在“普通话”一词已被广泛认同的情况下，将其改称“通用语”，势必让海内外同胞再经历一个过渡时期（或“接轨”阶段）。况且，即使改称“通用语”，它的内涵仍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

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普通话”条）在英语世界里，它依然是对应 Mandarin。

如此看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沿用“普通话”称谓不会影响到“与国际接轨”。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使用哪个称谓，关键是如何大力推广普通话，在“推广”上下工夫，如语委主任许嘉璐先生所言，尽快“使十二亿人都懂得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道理”。这样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而“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国古今的通用语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同一民族也有许多语言分支。那么，我国古代是怎样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呢？据《辞海·雅言》载：“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这就是说，雅言是我国古代的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说，孔夫子在山东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就是靠雅言来讲学的。

我国古代的雅言又是以什么语言为基础呢？据有关资料的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约在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打败商纣，周朝建立。在这以后的 800 年周朝历史上，周朝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的国都丰镐（今陕西省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就

成了全国的雅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最早的通用语是以陕西地方语言，特别是西安一带的语言为雅言的标准音及基础方言。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

汉代有一种叫“通语”的共同语，直到宋代还在使用。苏轼贬居海南时，即同友人设馆教书，以通语执教。唐宋以后，把官场中通用的话叫“官话”。

元代以后，京城都在北京，北京语言很快就成为全国通用的“雅言”了。

在清代，读书的人都要说官话，官员办公时不说官话，就要被免除职务。后把北方话诸方言系统称为“官话”。“普通话”之名由清末学者朱文熊首先提出，他在1906年所著《江苏新字母》中，把汉语分三类，其一即为“普通话”，解释为“各省通用之话”。民国初定名为“国语”，被当时教育部规定为法定教学语言。“官话”、“普通话”、“国语”的发展，规范日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为今天普通话的推广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解放后新中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今天的普通话的科学含义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由于国家的重视，民族的空前统一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实行，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与发展。

“普通话”名称的由来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

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叫“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久，就有人反对。1931年，瞿秋白曾反对“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成了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至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所作“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

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分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5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廿（“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2月19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时齐兵”误听为“10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

统。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雅言”。《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著《方言》，记录了2000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广全国，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看作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杯麓堂诗话》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